

# 城市狂欢的传统表现和 《红楼梦》的元宵节庆

詹 丹 张 瑞

内容提要: 传统诗文小说, 主要表现的是作为城市狂欢意义上的元宵活动, 但也蕴含了复杂的意义。《红楼梦》中的元宵活动主要在私人空间展开, 小说继承了此前元宵节活动的表现意趣, 但更强调其繁华背后的脆弱或者生活意义的匮乏。在对元宵节庆活动的具体描写中, 小说暗示出, 元宵活动不但是家族衰败、人物心力交瘁的征兆, 而且也是造成这种衰败和交瘁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元宵节 贾府 繁华 衰败

在《红楼梦》中, 有关元宵节庆活动描写的意义十分明显。第一回在写到甄家兴衰的一段历史中, 元宵节就被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我们看到, 前往世俗社会点化世人的一僧一道, 在与甄士隐相遇时, 就指着他念出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 菱花空对雪渐渐; 好防佳节元宵后, 便是烟消火灭时。”把僧人的言词视为是一位得道的高人对未来的一种预言, 或者说仅仅是一种能够在相应的时间得到应验的谶言, 可能会忽略元宵节在这其中的复杂意义。因为这种复

杂意义，既是作者对传统诗文小说的多方面描写的因袭，也显示了他赋予《红楼梦》这部作品的特殊用意。

有学者把元宵节庆活动上溯至西汉，虽然这种说法尚有一定争议，但至迟到隋唐，那种举国欢腾的狂欢景象，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延续到后代，逐渐成为世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在城市里，元夜出游赏灯，是元宵活动的主要内容，即便实行宵禁的唐朝，也允许例外。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载：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

元宵灯会，成了盛世的象征，也与都城生活紧密相连，所以诗人李商隐在《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一诗中，因自己元夜不在都市而咏叹道：“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向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那种灿烂如同白昼的辉煌，那种城市大规模人流积聚起的群情涌动的气氛，不但使灯会成为一道吸引人的景观，即便游人，也让人投注了许多目光。《说郭》载：

司马温公在洛阳闲居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

而《大宋宣和遗事》更直接描写了这种游人如织的景况：

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绡金里肚，妆着神仙；佳人都是戴髻肩冠儿，插禁苑瑶花，星眸与秋水争光，素脸共春桃斗艳，对伴的似临溪双洛甫，自行的月殿独嫦娥。那游赏之际，肩儿厮挨，手儿厮把，少也是有五千来对儿。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题咏灯会，赞叹元宵的热闹欢乐乃至狂欢，虽然是传统诗文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切合着大部分民众对元宵佳节的心理感受，恰如唐代诗人崔液《上元夜》一诗中所说的“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逢灯不看来。”但这种普遍性，并不能代替或者说遮蔽有些文人以另一种眼光，来抒发对元宵节庆活动的别样感受。

作为一年之初第一个月圆之日，其给世人产生相聚团圆的联想是最自然不过的，但也恰恰是在元宵夜，却有人在为不见去年人，而“泪湿春衫袖”。

在光灿照人的灯的世界里，人的灿烂与灯的灿烂本应该是交相辉映的，所谓“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但也恰恰有人喜欢抽身离开那片群情涌动的欢乐世界，在灯火阑珊处，独立无语，构成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词中的独特画面。

更不用说，在城市群情涌动的狂欢和个人亢奋之下所潜伏的那种无序和不安定。

《旧唐书·中宗纪》就记载，在万民同欢时，有宫女乘机逃逸的：

（景龙四年）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有亡逸者。

宋人笔记小说《夷坚志》中,曾记有歹人在元宵节,假借姻亲相邀观灯名义,把宗王家未嫁之女拐走。

而明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五,也是依据宋人笔记材料,叙写了敏襄公在京城元宵夜被歹人拐走儿子的事件。<sup>⑪</sup>

对于这样的无序、不安定状态,有人甚至能够坦然接受之。《帝京景物略》中载:

金元时,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sup>⑫</sup>

相比其它诗文小说言,在《红楼梦》诞生之前,更全面地把元宵节容纳的种种复杂性展示出来的是《金瓶梅》。关于《金瓶梅》与城市元宵节庆的特殊关系,笔者另有文章予以探讨<sup>⑬</sup>,这里仅想概括指出的是,该小说在物与人的描写中,表现了元宵节庆活动内部的种种张力和矛盾。比如:纸糊的花灯虽然漂亮,但一阵风来,就能把它吹出个“大窟窿”(第十五回的第一次元宵);烟火虽然光彩夺目,只是一瞬间,就会“火灭烟消成煨烬”(第四十一回),而制作烟火的伙计也把元宵一语概括为“堪笑元宵草物”(第四十二回的第三次元宵)。再比如,打扮美丽的潘金莲在狮子楼赏灯时,就有旁人的议论把她和谋杀案联系起来(第十五回),妇人成群结队出门走百病,家里就发生失窃的事件(第二十四回的第二次元宵),更不用说,《金瓶梅》提及的元宵节庆狂欢活动,总是让人物沉浸在过度性事的迷狂中,并最终导致第四次元宵期间西门庆的脱阳死亡。特别是,在书中有关第一个元宵节的描写就是因为李瓶儿的同一天生日而引入,随着男主人公西门庆在第四个元宵节的死亡,小说世界里的最后一个元宵节描写,也就此告终。于是,作品中反复提到的人死如灯

灭,以及像风中之灯既美丽又脆弱的生命,在对元宵节的场景描写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 二

脂评曾不止一次把《红楼梦》的一些描写技法与《金瓶梅》进行了联系。同样,有关小说情节中元宵节的设计,以及赋予的特殊意义,也是承继《金瓶梅》而来的。虽然在《红楼梦》中,作为一种城市风俗生活的具体展示远不如《金瓶梅》表现得那么全面而广泛,也摒除了《金瓶梅》一书中,小说男女借着节庆团聚而对性活动的过于沉溺。但是,那种有关元宵节的表面华丽与内在脆弱、那种热闹与冷清的矛盾对比,在《红楼梦》中依然得到了贯彻。

似乎是一种巧合,如同《金瓶梅》一共写到四次数元宵节一样,《红楼梦》全书也共写了四次数元宵节。不同的是,《红楼梦》中,第一回关于第一次元宵节的描写,涉及的是甄家。只是从第十八回的第二次元宵节描写起,才开始交代贾府的活动。但在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写了第三次元宵节后,应该在八十回以后才有的最后一次元宵节描写<sup>①</sup>由于原稿散佚或者作者的设想并没有付诸具体实现,所以我们的讨论,也主要针对前三次的元宵节描写。

从表面上看,《红楼梦》中三次有关元宵节活动的描写,第一次涉及的甄家和后两次涉及的贾府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差异。因为不但甄家的地位、人物的身份不能与贾府相提并论,而且甄家关键人物在元宵节的活动地点,主要也是在户外的城市街道看灯,这跟贾府主要是在自己的园内过节,气氛上有很大区别。但是,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甄家的元宵节经历写出他们家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灾难,是在元宵夜,他家心爱的女儿英莲被人拐走,让他们全家在佳节的欢乐中一下

子跌进了深渊。而贾府,最早提及他们家的元宵节,是迎接元妃省亲这样一件非比寻常的大喜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甄家的灾难与贾府的喜事就没有可比性。如果确如脂评所提示读者的,甄家的变故是贾府败落的一种缩影,那么,这样的缩影,具体到元宵节的情节设计,恰恰在貌似反差极大的有关灾难与喜事的两元宵节描写之间,即甄家的变故与贾府的迎接省亲在意义上有实质性关联,作者的写作意图,才得到了深刻体现。

元宵夜的城市狂欢一般都是以人们走向户外,走出锁闭着的冬天,把群体的热量和热情积聚在一起相激相荡为特征的。所以,作者写甄家的英莲在半夜看灯被人拐走,虽然关于元宵灯会的盛况、人群的热闹不及一词,但这一由来已久的习俗,人们对此活动的普遍参与,乃至传统诗文的持续描写,以构成英莲被拐事件的现实背景,也是读者理解的前提条件。所以,展示甄家元宵活动的笔墨,是极为简略的。不过,当元宵活动在贾府中,是以元妃省亲这样的一件非常大事为内容时,作者一笔不苟的详尽展开,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作者把贾府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元妃在元宵节的省亲活动,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脂砚斋是从“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来”来加以赞誉的<sup>⑮</sup>,似乎表明了,略写小康百姓的元宵活动而详写元妃省亲,是足以让没有此类经历的读者会产生独特的阅读体验。

由于元妃省亲必须表现出帝王的威仪,程式化的省亲程序,使得元宵节特有的狂欢情绪,在人物的言行中较难得到体现。所以,贾府中人也只能把那种欢乐的气氛、迎接的热情移出人物自身,有意构建起一种光彩照人的园内外景观,依靠外观而不是人物自身的情绪,来渲染元宵节庆本应有的狂欢气氛:

那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忽又见执拂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乃下舆。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朗;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于枝上的,每一株悬灯数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的。诸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诸灯,珠帘绣帟,桂楫兰桡,自不必说。

当然,这一物质化的欢乐气氛,是以大量的银两耗费为代价的。穷奢极侈可以表现出热情欢乐的程度,也是贵为娘的元妃享受的政治待遇所必须的。然而问题是,当元宵节的省亲喜事变得如此奢侈时,喜事也就变成了贾府的一个不堪承受的经济负担。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贾府的窘境有着形象的描述,所谓“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贾府却没有对省亲作低调处理。关于此次元宵省亲共耗费多少银两,书中虽然没有列出一张财务明细表,但就从第十六回中看,论及去苏州采办演戏的女孩子和行头所需三万两,以及添置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需要二万两白银,其总支出一定相当惊人。正因为此,在下一年元宵节前,贾蓉接着贾珍的话头向前来交租的乌进孝大叹苦经,所谓:“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可算是实话实说。

这样,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给王熙凤,关于元妃省亲的所谓“非常喜事”,在我看来有着别样的理解:

眼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

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

虽然她是以盛筵之散来告诫凤姐的,但这喜事本身给贾府带来的沉重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压垮了贾府的经济基础,使得我们有理由把它与甄家遭受的灾祸联系了起来。考虑到作者曹家在历史上数次接驾实际承受的经济负担,并成为导致家族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贾府的元宵节庆与甄家的灾难联系起来分析,就不是我们读者的异想天开。同样,在第二十二回,元妃从宫里送出的谜底是爆竹的灯谜,其声震如雷与化灰的关联性,虽可以被认为是对自身地位的隐喻,但其喻像本身,也是可以统一在元宵节的总体意象中的。

### 三

元宵省亲不仅仅是对贾府物质上的沉重打击,显示了祸福的含混性。就是在情感体验上,也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亲人团聚本应带来欢乐,但恰恰是元妃在元宵节的省亲,伤感的而不是欢乐的情绪贯穿于聚会的始末,也渗透在她对三组不同人物的言语中。其对贾母王夫人等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对其父贾政道:“田舍之家,虽菡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最后对宝玉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这种悲哀,似乎把血缘亲人间的每一类关系都囊括了进来。如果说,节日的意义是在于对刻板的、不自由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打破,使平日压抑着的一种欢乐情绪充分宣泄出来的话,那么在这里,亲人的一宵团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分离的事实,而仅仅是把平日因为分离而被压抑着的悲哀释放了出来。



因为这样的情绪是省亲的元妃和迎接省亲的贾府中人所共有的,这样,我们也只有在省亲别墅的物质环境中,在借由物质因子营造的气氛中,才感受到了元宵佳节亲人团聚本应有的欢乐和祥和。结果是,这种欢乐气氛越浓重,外观越璀璨华丽,其与贾府中人物的情感体验就越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既从叙述者角度的具体视角中反映了出来,也涉及到其他人物(比如众姐妹赋诗)的一种立场。林黛玉用“世外仙源”来题咏省亲别墅: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其题咏的如同仙境般的其乐融融,与此前亲人见面时悲悲戚戚的场景联系起来的话,也给小说增添了反讽色彩。

当小说进入到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回,写及贾府的第二次元宵活动,其反讽的色彩同样清晰可辨。

因为没有元妃省亲这样的非常事件,也就没有非常喜事中蕴含的悲情的大冲突,以及赏心悦目的景色与难堪的经济负担之间的尖锐对照。但是,生活的日常性,人们沉浸在欢乐中的不自觉性,表面看是消解了冲突,其实是把那种冲突消溶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从而使作为生活事件意义的反讽性,渗透至生活本身。

贾府的日常生活是以贾母为中心的,第二次写到的元宵活动,也不例外。因为贾母年事已高,以及他们的贵族身份,所以贾府中人是在园子的花厅里安排欢聚,并没有像传统小说中提及的女性,是在元宵节观灯走百病那样,走到户外,参与到陌生人群的狂欢中。他们基本是以静坐不动的方式,陪着贾母来看戏听故事说笑话。在此过程中,引发众人的接连不断的笑声,似乎也能够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出来。但细

究这一过程,依然会发现其蕴含的别样意味。

第五十四回的回目突出了贾母听才子佳人故事时一番反驳,其对故事模式化、俗套化的反驳,自然可以构成小说的一种情节冲突,并为元宵的娱乐活动增添兴趣。我们还可以把这番议论与小说开头,作为叙述者的石兄以及脂评在多个场合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反驳联系起来,以为这里表现出作者认识现实的清醒眼光,以为这是《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一种超越,等等。但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贾母据以反驳的,是她对一个大家族的环境以及环境中的所谓的才子佳人的认识,认为双方既不可能相遇,即便相遇,佳人也不可能马上就想到终身大事。贾母看到了这种故事的虚假、污秽以及对礼教规矩的破坏,并严正声明这样的事自己家里不可能有,这样的故事也不会让自家小孩子听。但贾母的这番议论,只具有认识现实的普遍性,却没有特殊性。特殊到贾府孩子们住的大观园,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与世隔绝,以及宝玉与黛玉的先天情缘,使得贾母的一番反驳,只显示了她聪明反被聪明误。由此可见,作者在处理贾母的这番反驳言论时,并没有与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个立场,而是把这种简单的反驳纳入到自己的笔下,并在扬弃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中,把那种简单的反驳也一并纳入到自己讽刺的对象中去。其实,贾母反驳的目的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而是对自己家族尊严的维护。但是,考虑到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点明贾府的后继乏人为其衰败的主要迹象,那么,贾母的声明,其反讽色彩就更加鲜明。

贾母批驳陈腐旧套自以为目光如炬,其实恰恰显示了她对身边人物的无知,让读者从她的聪明中发现了不聪明。在其接下来的笑话中,聪明与愚笨的界限模糊,又集中反映到王熙凤身上。当贾母叙述一个媳妇因吃了孙猴子的尿而变得心巧嘴乖,偏偏有凤姐当场声明自己的笨嘴笨腮,这看是凤

姐的聪明处,或许也是她的愚笨处。她的聪明似乎要急于撇清自己,而她的愚笨在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但仔细想来,这种声明此地无银的愚笨,也许正是她想追求的效果。因为她要急切让这笑话对景,是一种向老祖宗乃至众人撒娇式的讨骂,同时也是用一种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假聪明来故意暴露自己,从而再一次博得众人的笑声。但是,虽然她得到了这样的效果,也未必就此说明了她的不愚笨。因为贾母的笑话是预设了心巧嘴乖与吃尿的必然联系,从而让我们觉得,王熙凤的装傻,其竭尽心智需要制造欢乐的努力,只不过是一次自认吃尿的行为。这究竟是证明了她的智慧高超,还是证明了她的智力枯竭呢?也许有人认为,这笑话本身的娱乐性,不值得我们在意义上作过多的联想,但涉及到元宵节庆这一特定语境的反讽性基调,我们从这一笑话及其王熙凤的反应中分析其反讽色彩,也是合乎情理的。

当然,关于元宵节直接的反讽意义,是在王熙凤给出的故事中得到总结的。当大家都急切地听王熙凤来讲故事,王熙凤以她的伶牙俐齿,叙述了在元宵节的众人积聚后,除了对这一群体发一句感慨“真好热闹”外,却没有给她的人物以任何行动的内容。这段笑话,被王蒙戏称为是“淡化情节的先锋派小说”<sup>⑩</sup>。只是在他人的再三追问中,她才以“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来归结。而众人呢,“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别无他话,都怔怔的还等他下话,只觉冰冷无味。”继而,王熙凤又以一个聋子放爆竹,爆竹放过了聋子还不知道的笑话,把对元宵节的总结意义进一步深化了。

#### 四

如果说第一次元宵,因为有元妃省亲这样的非常事件而

使这一节日活动比较特殊的话,那么,在第二次,在以贾母为中心,在以贾母的欢乐为欢乐的活动中,妙语连珠的王熙凤,却冷不防讲出一个让人感到如此冰冷无味的笑话,与其说是她的卖关子,还不如说是她对竭力支撑起的元宵节活动意义流露的直觉式的迷茫。对贾母而言,利用元宵节的团聚,靠众人烘托起的欢腾,会使她进入一个欢乐的巅峰,并体会到家族长盛不衰的幻觉。但对这一活动的实际组织者王熙凤而言,在家族日趋衰落、人心日益涣散的过程中,勉力支撑起的这种欢会,除了看到人群的聚与散,除了感到自己身体的疲惫和心灵的迷茫外,已发现不了太多的实际意义。但是,众人却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要执着地来追问意义,来向元宵节活动索要欢乐。逼着王熙凤不得不在下一个笑话中,把这种追问的举动一并纳入其中了。在笑话中,聋子无法听见爆竹声,把别人偷偷点着爆炸的爆竹,是误以为爆竹没有扎结实,是爆竹自己散了架。王熙凤连用两个笑话的散,来连接贾府欢会的散,在词义上既有意关合着这一次的元宵离聚,但也无意中把家族之散暗示了出来。这样的一种艺术上的隐喻,还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表现的形象感问题。因为笑话反复渲染出的无意义,包括后一个笑话强调万人集聚只听得一声“噗哧”,而聋子甚至连这声音都没有听到,甚至连爆竹放与没放都不知道,从一方面看,固然是强调了聚会的无意义,强调了聋子抱怨的可笑,但另一方面,也是把王熙凤自身的心力交瘁直接反映了出来。元宵过后王熙凤的小产,既是她心力交瘁的证明,也是家族的不祥预兆。

贾府的元宵活动是在城市元宵狂欢中开拓出的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的人们,并没有分享到户外狂欢通常带给人的那种自由与解放感,第一次的元妃,第二次的贾母,在群体中确立起的那唯一的中心,以及维持这一中心的必要礼仪与秩序,把众人在节日里才能有的片刻的自由给剥夺

了。即便是集体活动在苦心经营中也鼓噪出一种繁华和欢腾的表象,但追求这种繁华与欢腾,给家族的财力、人物的心力造成的打击,还是把繁华和欢腾的意趣带向了反面。虽然陶醉于繁华的家族中人,他们的自以为是,并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一如他们陶醉在元宵灯会的璀璨中,不能自醒。

令人不无感叹的是,当贾母身边的鸳鸯和宝玉身边的袭人得以稍稍离开主人的权力控制、离开这种表面的喧嚣和欢乐、离开灯火辉煌的世界而来到怡红院室内时,她俩歪在炕上悄悄说着话,那种难得的清静世界,使得室外的贾宝玉都不忍心来打破它。本来,贾宝玉突然离席而回到怡红院,不过是要去撒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并无多大意义的生活细节,却引出了在光华灿烂的世界外一个更真实、更有意义、也更让人难得一见的温馨世界。读过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的人,可能会有一种类似的联想<sup>①</sup>。此刻,借助于贾宝玉的一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灯火阑珊的别样的世界,但在《红楼梦》中,却不是被人众里追寻中有意得来的,而且也只存在于短暂的瞬间。

### 注释

本文索引《红楼梦》原文,皆出自岳麓书社2001年出版的《红楼梦》。此版本所据底本是乾隆抄本《红楼梦稿》,本文所引用文字均出于此本,下不一一注明。

学者们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史记·乐书》中的一段话,即: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

不论”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第四册，一一七八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大唐新语》卷之八，第九一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一，第十六册，第六二二一页，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说郭》卷三十四，第一五七六页，宛委山堂本，据《说郭三种》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大宋宣和遗事》，收入《宋元平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全唐诗》卷五十四，第二册六六七页，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全宋词》第一册，一二四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

《全唐诗》卷四十二，第二册五二三页，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旧唐书》本纪第七，第一册一四九页，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 ⑪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111页。
- ⑫ 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 ⑬ 詹丹、张瑞《城市娱乐和金瓶梅中的元宵节庆》，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 ⑭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 ⑮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21页。
- ⑯ 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6页。
- ⑰ 唐圭璋选编《全宋词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23页。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邮编：200234）